

背景资料

背景介绍

加拿大反歧视与反排外联盟

什么是现代排斥？

在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加剧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出现了一种危险的趋势：惩罚那些不符合狭隘“国家利益”定义，或仅仅因与外国有无害联系的公民。来自社会各界的加拿大人因此遭遇歧视与污名化。这正是“现代排斥”的体现。

尽管这种歧视往往是非正式的、隐性的，有时甚至难以被清楚界定，但其影响却并不轻微。凡是被指控“外国干预”或“外国影响”的个人或机构，都可能面临被孤立、被污名化，甚至遭受刑事起诉。商界人士、学者、公务员、社区服务工作者等各类加拿大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

政界人士对此未能及时制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问题的发展。他们未能对媒体上由利益相关方散布的不实或缺乏依据的“外国干涉”指控作出质疑。2024年6月，加拿大国会通过了一项严厉的国家安全法案（即C-70号法案），其中设立了一项新罪名：代表外国实体干预加拿大政治程序。虽然该法案并不完全禁止个人代表外国实体参与政治事务，但一旦此类参与被认定为“秘密进行”，就构成刑事犯罪。任何与外国实体“有关联”却未在“外国影响透明登记册”中正式登记的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秘密”从事相关活动，从而被控犯罪，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

加拿大历史上的排斥

在加拿大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的少数族裔排斥现象并不少见。这些令人憎恶的行为往往以“种族优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利益”的名义被进行合理辩护。最早、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原住民：第一民族、梅蒂斯人和因纽特人。他们在殖民扩张和剥削的体系下，被剥夺了对自己土地和生活方式的主导权

，至今仍在为正义与和解而努力。

加拿大的移民群体则经历了另一种形式的排斥。早期的定居者在政府的支持下，基于种族主义或排外情绪，对新移民制定出各种歧视性政策。

加拿大历史上存在许多移民群体遭受排斥的例子。早在17世纪就移民加拿大的黑人群体，因为他们的肤色而长期遭受种族主义、歧视隔离和仇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加拿大政府曾制定政策，阻止黑人移民进入加拿大。同一时期，从俄国逃亡而来的杜霍波尔教徒（Doukhobors）在抵达加拿大后遭受迫害和污名化，其中包括他们的孩子被强行带走并送入机构收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的乌克兰人因加拿大的《战争措施法》被视为“敌国侨民”而被关押。1914年，为逃避印度迫害，寻求庇护而乘坐“驹形丸号（Koma gatu Maru）”抵达温哥华的锡克教徒，却被拒绝入境并最终遭到驱逐。

二战期间，3.1万意大利裔加拿大人被冠以“敌国侨民”身份，其中700余人被逮捕并送入拘禁营。日本裔加拿大人更是遭受严重迫害：2万多人被剥夺财产、强制迁移并集中关押。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统治下试图移民加拿大时，也遭遇种族主义和偏见。在1933至1945年的12年间，加拿大仅允许约5000名犹太难民入境。当时负责移民事务的部长曾公开表示：“一个都嫌多”（“None is too many”），这一态度得到了时任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的支持，他认为大量接纳犹太移民会对加拿大社会构成威胁。1939年，“圣路易斯号（MS St. Louis）”上的900名犹太难民被加拿大拒绝入境，其中许多人最终被迫返回欧洲并在大屠杀中丧生。

近年来，穆斯林加拿大人也成为一种特殊形式排斥的受害者，尤其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穆斯林群体经历了过度的安全审查，面临仇恨言论、人身攻击、歧视和社会污名化。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至今仍未消退，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在对巴勒斯坦裔加拿大人的不公对待上。他们因支持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冲突的公正解决方案而被不公平地贴上“暴乱者”和“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

虽然上述所有例子都属于加拿大的“排外”行为，但“排斥（Exclusion）”这一词本身最紧密相关的案例是1923年的《华人移民法》，俗称“排华法案”。在政府尝试通过人头税限制华人移民未果后，麦肯齐·金政府通过了彻底禁止华人移民的法案。该法案还规定，所有在加华人必须向政府登记并随身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否则将面临罚款、监禁或驱逐。这项法案持续生效达24年之久。

因此，“移民排斥”是加拿大历史上的一大污点，并且至今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虽然加拿大政府不太可能回到类似《排华法案》那样对特定群体实施全面移民禁令的时代，但同样类型的种族主义、仇外情绪，以及以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为由的论调，正在被用来为当代形式的排斥提供辩护。

今天的现代排斥

针对华裔加拿大人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有联系的加拿大人的新型排斥，正逐渐被社会和政治视为一种“常态”。这种当代的“仇华情绪”并非针对所有在加华人，而是试图将华裔加拿大人划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排斥”的现代版本，更是一种新的种族主义：更隐蔽，也更危险。将“外国干预”恐惧政治化，助长了对华裔加拿大人及其他群体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往往仅仅基于谣言、影射和偏见。对那些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或仅仅是不认同主流“中国威胁”叙事的加拿大人，普遍存在不忠的预设，这种标签化导致他们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中遭受不利影响。

这种情绪在外部压力、集体思维和国内政治的共同作用下，已经被固化为实际政策和法律，例如C-70号法案。警方、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在政界指令和自身偏见的推动下，正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加拿大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这种病态不仅影响了许多少数族裔群体，并且由于在当前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华裔加拿大人及与中国有联系的加拿大人，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正面临一系列独特而严峻的挑战。

当下的国际地缘政治使得与中国有联系的加拿大人尤其容易遭受排斥，但这一问题在未来也可能因国际关系和权力政治的变化而波及其他国家或族裔群体。无论国际风向如何变化，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都不应因此而受到削弱或妥协。